

文化节庆 齐鲁气象

文化节 节节高

文化观察

□ 本报记者 石念军

近日，齐鲁大地的“文化日历”再续新篇：南有第十届中国墨子鲁班科技文化节聚业界大咖，西有第十七届江北水城·两河明珠（聊城）葫芦文化艺术节喜迎八方来客。

从阳春白雪的学术殿堂到人间烟火的市集街巷，这些丰富多彩的文化节庆活动，作为产业山东发展活力的直观呈现和文化山东与时俱进的活化载体，处处展露着区域发展的内生力量。文化山东的一年四季，百花齐放的地理标志节庆活动已然绘就绚丽多元的文化图谱。

百花齐放

系列主题文化节庆活动是多元齐鲁文化的生动呈现。

墨子鲁班科技文化节以滕州历史上最为璀璨的明星人物——“科圣”墨子和“工匠鼻祖”鲁班为主题，融合智慧与文化，吸引人文与自然科学专家学者与会。葫芦文化艺术节则以聊城当地特色产品“葫芦”为载体，融合“福禄”文化传统，倾力打造融合产业、文化、旅游、商贸为一体的城市品牌。

放眼山东各地，类似的主题文化节庆活动，已呈“百花齐放”之势。孔子文化节、黄河·泰山文化节、泉水节、啤酒节、风筝节、齐文化节、书圣文化节、牡丹文化旅游节、海岛文化节、金沙湾运动文化节等，早已盛开于山东大地的四面八方。

它们是文明互鉴的齐鲁窗口。作为山东最具国际影响力的文化品牌，每年9月，孔子文化节会聚四海宾朋，以庄严隆重的祭孔大典，共同感受中华文脉的生生不息。

它们是一方水土的文化自觉。齐文化节围绕“变革、开放、务实、包容”的齐文化精神，深挖历史智慧。临沂书圣文化节聚焦书法艺术，让王羲之的书法精神在新时代焕发新光彩。墨子鲁班科技文化节则另辟蹊径，挖掘古代科技智慧，为“山东制造”注入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它们是文旅融合的创新实践。菏泽依托“牡丹之都”的资源优势，以花为媒、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枣庄从地方美食切入，打造消费升级引擎。济南国际泉水节更是将城市独有的泉水资源与民俗展演、音乐狂欢、亲子互动相结合，让“泉城”品牌愈加熠熠生辉。

它们是百花齐放的时代华章。山东文化节庆和大众艺术节作为省级层面的综合性艺术盛会，涵盖戏剧、音乐、舞蹈、美术、书法、摄影、民间文艺等艺术门类，成为山东艺术创作的“阅兵式”。

这些主题突出、层次分明、类型丰富的文化节庆活动，既有承载文化战略的宏大叙事，又有深入街巷田间的烟火气息，共同构成一个多元共生、和谐互动的区域文化生态圈。

节节升高

当前的山东系列主题文化节庆活动，始终保持着节节高的进阶特征。

定位高。过去一段时间里，有些活动名为节庆，实为地方性的文化展演与物资交流。相形之下，山东的头部节庆已自觉肩负起更为崇高的使命。

孔子文化节便是典范。它早已超越了单纯纪念孔子的范畴，通过设置“孔子教育奖”、举办世界文明对话，将一场地方活动升格为全人类共同关注的文化盛事。有着22年历史的齐文化节则深入挖掘“变革、开放、务实、包容”的精神内核，将其与当代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相连接，寻求区域发展的文化内因动能。而黄河文化旅游节等新兴节庆，更是直接呼应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体现服务大局的担当。

融合深。一个可见的趋势是，过往“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模式正在被颠覆，代之而起的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深度融合。

融合体育。泰山国际登山节完美结合文化与体育精神，让参与者在攀登中感悟“会当凌绝顶”的豪情；烟台金沙湾国际运动文化节让“运动”成为一种时尚的文化生活方式。

融合旅游。作为“以花为媒”的典型案例，牡丹文化旅游节更将“一次性”的赏花观光，转化为对城市品牌的长久关注，最大限度地实现了从“门票经济”到“综合消费”的转型。

融合商业。辣子鸡美食文化消费季、齐鲁小吃文化节等，通过“舌尖上的味道”打造富有吸引力的文化IP，直接驱动消费，再次证明文化本身就是一种强大的经济业态。

形式新。科技的赋能与理念的革新极大改变了节庆的参与模式，推动曾经的单向传播向沉浸式互动体验的迭代升级。“全球云祭孔”活动，利用现代传播技术，将遍布世界各地的文庙和儒学爱好者联结，实现了跨时空的文化共鸣。以技术革新为依托的内容形式创新，让传统文化突破博物馆的橱窗限制，成为青年群体喜闻乐见争相打卡的潮流体验。

从数量增长到质量提升，从单一展示到多元融合，从地域品牌到全国乃至国际影响。百花齐放、节节升高的系列主题文化节庆活动，已然昭示出一个文化大省的强省之力。

未来之路

登高望远，方知前路漫漫。矢志不移地推进文化强省建设，还需文化节庆活动作出更多创新示范。

文化的根本魅力在于与时俱进。文化节庆活动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具体表现，需要深度熔铸时代精神释放发展潜能。

可喜的是，深度融合古今的内涵建设和形式创新，始终贯穿于系列文化节庆活动之中，持续驱动着地方特色文化节庆活动的品牌化发展。

深化内涵建设，强化节庆品牌的独特性。恰如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院长王学典教授所言，“儒家思想为我们提供了修身齐家、重视伦理的文化根基，墨子思想则为现代工商社会提供了务实创新、互利共赢的价值指引。二者结合，才能让传统文化更好地服务于当代发展，这也是此次研讨会的深层意义所在。”着力聚焦古代科技智慧与现代创新对话的墨子鲁班科技文化节，正在通过独一无二的文化内核建设，拒绝“千节一面”、谋求“一枝独秀”。

拓展互动空间，提升品牌情绪价值。节庆的核心是“人”，一个成功的节庆必然是全体参与者的节日。如何让旁观者变为参与者与代言人？百花齐放的文化节庆活动要想真正从百花丛中脱颖而出，就必须摆脱节目单的竞争，转向用户体验的竞争。尤其是在情绪价值驱动力越发突出的当下，如何设置更多让参与者“动手、动心、动情”的环节，创造独特的记忆点，必然是口碑效应的决定性因素。

完善评价体系，聚焦品牌长远发展。十几年前，各类节庆活动一度泛滥，经过规范和约束后，应该说，当前得以延续的节庆活动都是品牌化建设的样板。在这一情形之下，持续优化节庆活动的效果评估更显重要。也唯有超越“人次”和“收入”的单一维度，更多聚焦“文化传承度”“群众满意度”“品牌美誉度”“产业驱动度”等系列综合评价，才能更加专注于节庆活动的文化浸润力和影响力建设。而这都是节庆品牌深化塑造的应有之义。

节庆活动不是一时的热闹，而是以创造性转化驱动创新性发展的实践。当每一场节庆都能成为一个独特的文化IP，当每一次体验都能成为一次深刻的文化认同，文化节庆里的齐鲁气象，将会愈加宏大和璀璨。

让历史深处的英雄

可感可敬

□ 本报记者 师文静

近日，备受关注的谍战大剧《沉默的荣耀》圆满收官。这部剧热播并引发热议，除了精良的制作，还在于它使用历史人物真实姓名，讲述真实事件，让冰冷的史料和历史人物鲜活地呈现，从而引发观众发自内心的情感共鸣。

《沉默的荣耀》中，隐蔽战线工作者吴石将军甘冒奇险去台湾，不顾个人安危，与朱枫、陈宝仓、聂曦等组成“东海情报小组”，继续为新中国提供重要军事情报，谱写了可歌可泣的传奇。

最令人动容的，是创作者以细腻的表现手法塑造的一个个英雄人物。以往的大多数谍战剧主角，无论在刀尖上行走，最终都能因算无遗策功成身退，取得潜伏的胜利。而吴石、朱枫、聂曦等先烈的真实故事，最令人感动的是他们的理想信念与意志品质，是他们明知可能牺牲却主动抉择、拼尽全力奋斗的过程。这些闪光的人物，带领观众走近那段历史，真正理解什么是生命的抉择，什么是热血践行的信仰。

吴石一出场，一句“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的慷慨悲壮之语，便抓住了观众的心。他的家国情怀、为信仰和国家赴死的决心，从未改变，且体现在一举一动之中。临行前，他深情吟唱“我身骑白马走三关，我改换素衣回中原”，英雄豪情与柔情交织，尽在不变的乡音中。随着剧情的推进，在吴石与不同人的对话中，观众更加理解他为何主动走上这条荆棘之路。他早已看清了国民党政权内部的贪腐，尔虞我诈和派系林立，“人人心中有自己，大多心中有派系，少数心中有党国，唯独无人心中有人民”，他坚信共产党才会让中国繁荣富强，他向往的是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

坚定的信仰和知识分子的家国深情，让吴石周身散发着光芒。他纯粹、智慧、儒雅、坚韧，无论是作为坚定的战斗英雄，还是作为师长、父亲、丈夫，每一面形象都堪称完美。在战场上，他是足智多谋的斗士，在台湾迅速扛起地下党组织负责人的重担；在组织失去联络通道后，又冒着巨大风险亲自到香港传递情报；在斗争过程中，他通过菜单、《金刚经》等传递绝密情报；在与劲敌周旋的过程中，以谋略揪出内部奸细；在被捕的时刻，依旧绕开敌人将最后一份情报完整传递出去。惊心动魄的较量中，吴石展现出过人的胆识和智慧。除了为家国之信仰而战，吴石也有生活化、烟火气的一面，剧中着重刻画了他有情有义的一面，他对妻子和儿女、对下属、对每一位一起战斗过的战友都关怀备至，在最为危急的时候，依旧事无巨细地关注到每个人，安排好大家的去路。他为司机小钱和妹妹的死而洒下热泪，他甘愿冒险、千方百计去救下战友的弟弟，这种伟大的情义和担当，令人赞叹。

剧中另一个人物朱枫，是一个柔中带刚、重情重义的女性革命者形象。她毅然决然，主动要求赴台接任交通员，无论是整理母亲遗物时的落泪，还是对养父一家人的关照，与吴石妻子王碧奎的深厚感情，都让人感受到她对生活的热爱、对亲情的柔情。朱枫爱美、爱花，在牺牲前，一朵花被她捧在手心陪伴着她。这部剧对每个人物琐碎生活细节的塑造，让角色可触可摸、可感可敬。

《沉默的荣耀》秉持“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通过艺术感染力，吸引观众的注意，唤起可贵的民族集体记忆。这部剧既是对隐匿于历史的英雄的回望，也让观众透过这些英雄，重新审视何谓家国情怀，何谓忠诚与信仰。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本可以过自己安稳的日子，却为了让战争停止、让百姓生活安稳，走上了这条隐蔽、艰难又孤独的道路，这正是传统知识分子家国情怀的体现。观众看到他们为了理想而步步惊心的潜伏历程，在极端困境中的坚守，用生命和热血书写的忠诚，无不为之动容。他们坚守信仰与甘愿牺牲带来的震撼与感召，在每个人心间久久回荡。

这部剧播出后，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等人的雕像，故居迎来了参观热潮，大家自发前去掉念隐蔽战线上的英雄，送上鲜花、照片、高粱酒，用各种方式表达对英雄的敬仰与缅怀。大家用文字、图片、视频等多种方式，让英雄的事迹广泛传播，让更多人知晓他们的奉献与牺牲。这部剧让观众理解了什么是真正的英雄，什么是真正的信仰。这种英雄精神，将成为每个人生活中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



新大众文艺到底“新”在哪儿

□ 范玉刚

2024年7月，《延河》杂志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了题为《新传媒时代与新大众文艺的兴起》的文章，提出了“新大众文艺”的概念。“随着互联网、人工智能以及各种新技术的兴起，人民大众可以更广泛地参与到各种文艺创作与活动之中，人民大众真正成为文艺的主人，而不是单纯的欣赏者，这就是新大众文艺。”该文发表后，经公众号推出，其转发点击量大幅提升，达到数万甚至十万级。不可否认，《延河》杂志在文坛和文艺格局变动中彰显或者界定了新大众文艺之“新”的意味，在文学“破圈”和统合诸多力量发出的“宣言”中，推动了新大众文艺从自发状态走向自觉。

新大众文艺的崛起不是一个个别的突兀性现象，而是一个时代性现象（必然性），具有群体性特征，容易形成区域文化发展高地，这一点在山东省内调研得到充分印证。在我们看来，“新大众文艺”是一个分层的概念，是一个具有价值辐射力、场域裹挟性的概念，有着多样化形态，有多个来源，有其主导性形态、边缘性形态和被裹挟的部分。其中，新大众、新载体、新作品、新力量（传播力），是理解把握“新大众文艺”的关键词，也是其价值重心所在，我们更偏重对这些关键词作统合性理解，尤其更强调新大众（基层民众）、新力量（大众

传播力）。在此我们提出了自己的定义：新大众文艺主要是有别于专业作家、艺术家的基层民众以多样化方式和手段，进行文化自主表达的文艺创作和文化生产，并借助大众传播产生广泛社会影响力的新文艺作品和文化产品。在我们看来，所谓“新”是一种价值判断，是一种本质性的学术判断，更是一种理解时代、把握时代的文化（审美）政治判断。这种理解和定位使其涵盖范围有所缩小，但更有现实针对性，而不至于外延太广而几乎涵盖所有文艺，从而与专业作家、艺术家的创作生产有别（各自不同的价值引导与政策促进——文化价值、艺术价值）。

究其新大众文艺之“新”，首先是文艺创作和文化生产的主体之“新”，是新的文艺创作和文化生产的主体发生了变化，不再是少数文化精英，而是遍布全社会各领域的基层民众，成为新大众文艺创作与文化生产的主体，是一种文化主体性力量的崛起。作为一种广泛意义上的民众，以“新大众”标识基层“老百姓”既突破了政治中心话语框架，将抽象的“人民”还原为具体的、有血有肉的、差异化的个体，又与曾经流行的大众文化之“大众”（标识中产阶层的小众）作了区隔，其内涵具有植根于传统文化“民为贵”的价值底蕴，从而赓续了传统文化的文脉；也充分借鉴和汲取了作为现代文明对公

民个体的尊重，其外延具有覆盖社会生活各层面的广度，而有着对现代文明价值的追求。作为一种接地气、有烟火气、通人气的文艺新话语，“新作品”在借势数字化大众传播中讲述老百姓身边抑或自己的故事，从而迎来了新大众文艺在新时代出场的机缘。

其次，从新大众文艺的创作与文化生产的现实境遇来看，信息化技术应用是其迅猛崛起的强大助力，也构成了其艺术形态跨界交融的态势，形成了新大众文艺显著特点之一的大众传播效应。从艺术形态上，借势信息化技术应用，不只文学创作，各门类艺术都在信息化技术应用中，不仅使其原有的艺术形态如文字类的艺术表达获得广泛传播，不断涌现如在线直播、微视频、微短剧等新形态，还使传统艺术形态如脱口秀等曲艺有了新的表现形式，极大地提升了艺术传播力与审美表达。一方面，使得新大众文艺出现泛文本化倾向；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参与文艺创作不仅带来创作范式革新，也引发了文艺“智能时代”的新变化。

再次，新大众文艺的“新作品”普遍有别于纯文艺的泛文化倾向，旨在建构一种有着较强辐射力与涵摄性的文化场域，这是其不同于所谓传统大众文艺的价值追求。严格意义上讲，新大众文艺不是诉求一种纯粹的艺术以及对艺术的卓越性追求，当然不乏艺术审美价值。但是，正是其普遍性的文化价值追求，使新大

众文艺在契合社会文化转向中以其蓬勃发展强化了文艺的文化转向，一定程度上是重构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文化基础的重要力量之一，强有力地参与了建构新时代文化发展的新视野，共同塑造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艺形态。

最后，新大众文艺之“新”，不仅体现在新主体、新载体、新作品、新力量（传播力），其实还接续了文化传统根脉。如此次“新大众文艺座谈会”选址淄博蒲松龄纪念馆，无疑有着对蒲松龄与《聊斋志异》的致敬与传承；此次会上也安排了两位学者专门就其创作历程和高超的语言艺术进行论述，足见大众组织者的用心。也就是说，新大众文艺的兴起，既传承了延安革命文艺“深入大众”的传统，也体现了新时代人民大众自我表达、自我生成的新特征，还有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赓续。

总体上看，新大众文艺的崛起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正是时代的变化迎来了新大众文艺出场的历史机缘，从根本上彰显了人民大众发自内心的文化自信，是普通大众的文化参与能力不断提升的结果，是信息化技术在文艺领域应用与大众的文化权益得到充分保障的产物，更是党的文化政策特别是文化惠民举措合力促进的逻辑使然，推动了新大众的崛起、新文艺业态的不断涌现，甚至出圈、破圈成为爆款文化现象。（作者系山东大学特聘教授、山东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山东省文联副主席）

